

张资平两次上书刘少奇要待遇

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多产恋爱小说而得名“三角大王”。和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郁达夫等留日学生创建了民国早期作家组织——创造社的他,虽在文坛上影响深远,但他不仅出任汪伪政府的官职,还在宣传汉奸文化方面不遗余力,为世人所不齿。郁达夫便怒斥他:“文化界出这一种人,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。”

这样一个文化汉奸,在新中国成立后仍不思悔过,曾经两次上书刘少奇,要求安排工作。

接连写信求职遭碰壁

1945 年,日寇降服,群奸纷纷落网,张资平却在国民党上海肃奸时漏网了。但张并不安分,1946 年春他竟敢以本名在《大众晚报》副刊上发表了《胎动期的创造社》和《创造季刊时代的创造社》两篇回忆录。这就惹怒了一位爱国老人,曾和张资平有交往的“民主斗士”丘哲,此人是 1906 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。1947 年 7 月,一封由丘哲署名的举报信寄到南京政府司法部长谢冠生的案头。这就出现了 1948 年 3 月 20 日,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对张资平汉奸罪嫌公诉审判的一幕。可惜一直延捱至 1949 年 5 月解放大军兵临沪郊也未开庭。其缘由自然是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,大小官员如鸟兽散,哪还顾得了这一场官司! 5 月 27 日,上海在欢迎解放军的欢呼声中迎来新生,张资平不知何故,似乎反松了一口气。

对于张资平这一心态表现的最好证明,是在 1949 年的 6 月间,正可谓新上海百废待兴的时刻,万分繁忙紧

张的新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,却一连接到了张资平的两封信。信中,张以急切的口气要求照顾安排他的工作。对他多年来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竟一字不提。当然,他致函潘汉年是有一番算计的,潘是创造社同人,北伐时也在汉口国民军总政治部与张共过事,应该讲是老熟人。而抗战时期,潘汉年出入虎穴战斗在上海租界“孤岛”,对张的汉奸嘴脸早嗤之以鼻,所以自然是弃之一旁,不给回音。

张资平等不及了,再寻其他人。7 月间,他在报上看到也曾是农工民主党发起人之一,正任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长的季方驻在上海,便千方百计地找去了,荒唐地要求恢复他农工民主党党籍。刚直不阿的季方断然拒绝。张碰了一鼻子灰出来走了。随即,季方将这情况通报到市政府,潘汉年本无暇问此事,现在张倒逼上门来,便指示市府办公室复函,通知他先到所居地长宁区政府登记并出具悔过书,再统一安排工作。

对张资平打击更大的,是东北人民政府高级人才招聘团到上海招人,他以张声为名应聘地矿学及外语教学两个专业,笔试通过后领取了盘缠等费用。当该团前往长宁公安局政审时,才发现这一张声竟是张资平。负责该团招聘工作的东北局文化部长刘芝明,本就是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海“左联”老战士,马上电告在上海的人员:“这种人怎么可以上新中国的大学讲坛?”后来该团召张资平去谈话,批评他隐瞒真实身份,是不诚实的行为,并当场追回了发放的路费。

1951 年秋,四面碰壁的张资平又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,对以往有所检讨并恳求安排工作。得到的回音,是通知他向当地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委员会登记。张资平知道这再一次证明上面对他并没有任何照顾的意思。可太无自知之明的他还不认真悔过,这就发生了张资平两次上书刘少奇的事情。

两次上书刘少奇

1953 年 6 月,张资平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发去了一函,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将回函转到了上海,所以上海市府办公室副主任沈北乐找他谈话,传达政务院文教委的回复,建议他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袁翰青联系,是否翻译些科技类书稿。张却认为,这类著作编译耗时,一两年都不一定成一本书,最好商务印书馆每月能支他一笔稳定收入。商务印书馆认为无此先例,最后张勉强接受了《化工大全》一书的编译工作。此外,经袁翰青牵线,张资平在教育局的介绍下,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是一所私立初中代课。然而仅隔了三五月,他又感觉不如意了,于是便再次上书刘少奇。

张资平在第二封信中说了他目前的“困境”:没有固定收入,而且他任教的那所私立初中,“学生态度傲慢嚣张”,“试卷容许学生查阅,以示民主……而当教师者则全无威信可言矣”……

刘少奇将张资平函转到了中宣部。中宣部于 1954 年 1 月 13 日又将张函转给了潘汉年,并致函称,是否为张资平就近找一份教学的工作,并在寒假期内能够解决。

为张资平找工作一事落到了上海市教育局一位副处长李槐之身上。他先去了张所在的学校,学校说张的经济不算困难,他每月固定收入总有 100 余万元(即人民币新币 100 余元),其中学校代课 35 万元,译书稿酬、版税等也有 60 至 70 万元不等。妻子也已工作,只有

两个小孩在读书。学校老师对他的评价不太好,称其上课时东拉西扯的。李将这一情况报告市政府办公室后,又专门向分管市文委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报告了一次。姚听后当场指示,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,他说经济有困难,对他们的政策是不能饿死人,可以说服学校再加他几节课嘛! 要批评张的教学态度,其它问题不予理睬,尤其不能姑息。情况汇总到潘汉年那里,潘表示同意,上海方面随后向中宣部汇报了上述情况。

终为汉奸罪行付出代价

说到张资平多次上书提及的经济窘困,实际也与他当汉奸时的那段生活相关。他在南京伪农矿部、伪中日友好协会任职,虽无什么实权,但还算高官厚禄,搭上了部里的一年轻女职员,那时他已年近半百,早有妻室儿女,却让那位女士连结珠胎,生下一对儿女。然而张资平不知检点,居然把他的婚外情生活写成了名为《新红 A 字》和《折柳》等小说,在书中不仅为其放浪形骸作“情种”辩解,还把日寇屠刀下的玄武湖畔描绘得歌舞升平,一派祥和。抗战胜利,人人喊打的汉奸张资平失去了固定职业,仅靠隐隐藏藏地写译文稿维持两个家庭。上海解放后,张一再上书潘汉年直至刘少奇,即是想获得一个正式的身份,并有一份稳定的收入。

就在张连连上书受挫已感无望时,1955 年 6 月,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将他逮捕。指控他的罪行,正是他当年投敌叛国、充当汉奸的经历。当年国民党方面起诉张资平,只强调他出任伪职,这次则十分突出地指控他撰写大量汉奸文字,宣传日、德法西斯独裁、侵略思想的文化汉奸罪行。1958 年 9 月,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 20 年。张资平终要为他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。

1959 年 12 月,张资平在安徽南部的一处劳改农场病死,时年 66 岁。

据《世纪》陈正卿/文

中国作家们的“马甲”

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更为多数人所熟知,久而久之,甚至都被认为是真名了。比方说,茅盾不姓茅,真名叫沈德鸿,字雁冰,我们常叫其沈雁冰。沈雁冰当年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,后来干脆就用能代表他心境的“矛盾”当笔名。叶圣陶当时做编辑,觉得沈雁冰的稿子很好,但“矛盾”不像个人名,就加了个草字头,变成了“茅盾”。

“萧红”“萧军”也是笔名,他们的真名叫张迺(音“奶”)莹、刘鸿霖。两位的笔名是有关联的,因为都是左翼作家,笔名合在一起就是“小小红军”。

巴金的名字,也让很多人误会过是真名。巴金是四川人,而四川有很多人姓“巴”。其实巴金的本名叫李尧棠,他想起个笔画少的笔名,省事儿。巴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,先取了个“金”字后来为了纪念一位离世的姓“巴”的朋友,便取了“巴金”这个名字。

作家使用笔名,这是一个文化常识,所以千万不要用笔名里的姓来称呼人家,不然会闹出笑话。

金庸造访北大时曾提出请求,想亲自去地下书库里看一眼。北大领导考虑再三,同意了,并派了一名馆员陪金庸参观。

恰巧,这位馆员是个地道的武侠迷,见到偶像,激动得话都快说不出来,上来就大声说,金先生好,我特别喜欢您的作品! 金庸微微一笑:“我不姓金,我姓查。”金庸真名叫查良镛,笔名是“镛”字的拆分。

金庸的亲戚查良铮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。查良铮做翻译的时候用真名,写诗的时候用笔名。他就是大诗人穆旦。显然,穆旦的名气要比查良铮大多了,好多人就以为他姓穆。穆旦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? 和金庸不同,他是把“查”这个姓给拆分了,上面是个“木”,下面是个“旦”字,“穆”是“木”的谐音。

“古龙”也经常被当作是真名。古龙原名熊耀华,和“古”“龙”都没什么关系,只不过是古龙上中学的时候,心仪的隔壁班的女孩叫古某凤,于是他起笔名的时候就起了个“古龙”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于壮/文

